維護共和—梁啓超之聯袁與討袁

張　朋　園

㈠ 梁袁關係

㈡ 從勸說到反抗

㈢ 反袁的基本理論

㈣ 軍務院的構想及善後辦法

㈤ 梁蔡反袁的志氣

民國肇建，梁任公分析國內勢力，謂有三大流派：一爲舊官僚，一爲舊革命黨，一爲舊立憲派①。他自己屬於舊立憲派，自不待言。然舊立憲派以何種態度與舊官僚及舊革命派相周旋，則煞費斟酌。任公在「共和黨之地位與其態度」講詞中肯定的說：「吾黨一面旣須與腐敗社會爲敵，一面又須與亂暴社會爲敵。」②所指之腐敗社會和亂暴社會，便是舊官僚派和舊革命派。兩派都在敵對之列。但是他又說：「彼兩大敵者，各皆有莫大之勢力蟠亘國中，而我黨以極孤微之力與之奮鬪，欲同時戰勝兩敵，實爲我力之所不逮。」旣不能同時戰勝兩敵，不得不有所選擇，「先戰其一」，第二敵「不得不暫時稍爲假借。」他認爲「革命之後，暴民政治最易發生，而暴民政治一發生，則國家之元氣必大傷，而不可恢復，」當首先加以「裁制之」。很明顯的，他要先對付國民黨，而與舊官僚有所假借。舊官僚派的主要人物是袁世凱，所以對袁氏取妥協態度。本文在討論其如何與袁氏假借，如何妥協。我們知道任公一派與袁氏假借妥協的結果，反而爲袁氏所利用，最後袁之野心畢露，稱孤道寡，置國家安危於不顧，舊立憲派亦弄到幾乎沒有生存的餘地，不得不回

① 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稿，（世界書局，臺北，民四七年），頁三八二。

② 飲冰室文集（中華書局，臺北，民四九年）之三十，頁二〇。

過頭來與舊革命派合作，共同討伐袁氏，此一行動，是即護國之役，這也是本文討論的重心。

(一) 梁 袁 關 係

戊戌政變以來，梁任公與袁世凱的關係，應該沒有妥協的餘地，因爲袁氏當年的態度是變法成敗的一大關鍵。若非袁氏洩漏維新派的計劃於榮祿，變法何至功敗垂成！故而從「賣主求榮」的觀念言之，任公於民國建立之後決無與袁氏往還之理。但是政治是現實的，何況戊戌政變的積怨已因歲月的變遷而退色。革命以後，朋儕之間分析當前的情勢，認爲袁氏實力在握，與之合作爲理所當然。張君勱於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致任公一書，謂發展黨勢，必須聯袁：

> 「竊謂今後中分天下者，袁〔世凱〕、孫〔中山〕二黨而已。吾黨處此時代，所以持之者有二：超然獨立，另標政綱，與天下共見一也；與兩黨之一相提携，以行吾輩所懷抱二也。如第一法之立身高潔，不斤斤於政權，以靜待輿論之歸，義極正大，且袁、孫二派皆非能建設今後之國家者，雖合無益。然立憲國中輿論之功，勢不能僅持其主義之純潔，必也與爭選舉，爭議席。如此雖欲常居超然，勢必有所不能。……由此言之，目前舍擇二派而提携之，別無他法。此二者比較的適於建設之業者，實在北方，故……下手之方，在聯袁而已。」③

張君勱亦知「袁氏爲人詭譎多術，頗不易合。」但聯絡的目的在發展黨勢，數年之後，黨勢能在各省確立，袁「雖欲不聽命於我，安可得焉？」

徐佛蘇更是極端主張聯袁的。他致函任公，所見與張君勱同：

> 「輿情……極欽倚項城〔袁世凱〕，將來之大黨必以項城爲中樞，吾輩亦不能不挾此公以彌補各種之危機……項城能大立黨，則國勢可以轉危，而未來賢豪乃有恢恢盾布之餘地也。」④

---

③ 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稿，頁三七二。

④ 同上，頁三七〇。

徐氏更敦促任公與袁氏「引爲政友」，謂「雖未必能冶爲一爐，然亦無極反之事。」

任公本有聯袁之意，其在清末組織政聞社，以袁氏爲「重要人物」，便有聯絡的意思，⑤可見存心提攜，由來已久。今日既然知友如張君勱、徐佛蘇等均言可合，益堅定了自己的信念，何況民國以後的袁氏，不僅重要，更是實力在握。從元年二月至四月間，梁、袁信函頻仍，任公並遣同窗湯叡（覺頓）親謁袁氏，開啓了雙方合作的機運。

任公未歸國前致袁氏各函，備至推崇，尤其是元年二月二十三日一函，爲袁運劃財政及政黨兩事，更是推心置腹，不避交淺言深。譬如其論當政者與輿論的關係，謂「善爲政者，必暗中爲輿論之主，而表面自居輿論之僕。」談到共和政治，竟主張開明專制，說「非參用開明專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齊嚴肅之治。」⑥這一類的話，袁氏聽了當然十分受用。

反過來袁氏也想拉攏任公。當任公自日本歸國，袁即預備前清軍警公所的官舍爲其行館。後來袁氏聽說任公對人言「曾文正、李文忠入京皆住賢良寺」，即「飭人舖設賢良寺。」⑦極盡拉好之意。任公受寵若驚，大歎「此公之聯絡人，眞無所不用其極也。」不僅如此，自任公回國之日起，袁即「月餽三千」。任公一度躊躇，終以「旅費家費皆極繁」，「非此不給」；又怕袁之猜忌，欣然接受⑧。袁氏善於籠絡人，舖設賢良寺，月餽家用，大張延席，不在話下。同時又約任公密談，表現誠誠懇懇，使人對此十餘年前的政敵，印象爲之大爲改觀，任公認爲袁氏確實可以引爲知己政友，及後談到出處問題，任公表示一時決不出山，願仍以言論爲依歸，袁即附和其說，給二十萬爲資辦報⑨。任公又說要組政黨，袁謂經費由其支持。

---

⑤ 張朋園，梁啓超與清季革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北，民五十三年）頁一八八～一八九。

⑥ 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稿，頁三八一。

⑦ 同上，頁四〇八。按任公並未接受袁氏的官式招待，而係別借一宅爲寓所，（時報，一、一〇、二一）蓋民主與共和兩黨人士均謂宜「以個人資格接受社會歡迎，不宜受政府特別招待，以授人口實。」（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稿，頁四〇九）

⑧ 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稿，頁四一一。

⑨ 同上，頁四一二。

聯絡之意之厚，殊非始料所及。至是，任公以爲中國舍袁氏而無可爲，有進一步支持而與之合作的決定。

支持袁氏，與袁氏合作，任公後來解釋其用意在引導與監督。譬如他在「護國之役回顧談」中說，民國三年春天，蔡鍔辭去了雲南都督職務，來到北京，便常約同湯叡與蔡氏相聚，研究政治、經濟、軍事，各人充實自己，「當時很有點癡心妄想，想帶着袁世凱上政治軌道，替國家做些建設事業。」⑩在另一文中又說：「當元二年之交，國論紛拏，啓超懼邦本之屢搖，憂民力之徒耗，頗思竭其駑駘，冀贊前大總統袁公，極圖建設。」⑪兩段話一一追述其引導意向。查證早先的言論，任公確實也說過類似的話。在進步黨成立大會上，他說：

> 「以今大總統〔指袁世凱〕論，中外報紙評其人者多矣！有敬愛之至極點者，亦有憎惡之至極點者。然無論爲愛敬、爲憎惡，要其爲人有一種政治才能者也。此種有政治才能之人物，握有政權之時，苟無一大政黨監督於其旁，日謀所以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則徒令此種政治才能，濫施於政治軌道以外，不亦惜哉！」⑫

這明白的表示了監督的意思。

所謂引導，所謂監督，是不是眞有此一意向？回答應該是肯定的。進步黨人劉以芬在他的回憶中說：「進步黨自創黨以來，其所取政策，即係與現實勢力相結合，意欲乘機而指導之，使成爲我國之中堅力量，以求安定一時之社會，並徐圖發展。」⑬劉氏道出了進步黨的去向，更說明了此一時期任公以袁爲「中堅力量」的想法。以政治社會學的眼光觀之，也可以求得正面的答覆。第一、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知識分子自認爲是時代的先驅者，學以致用，有引導社會之責，梁任公

---

⑩ 「護國之役回顧談」，飲冰室文集之三十九，頁八八。

⑪ 「在軍中敬告國人」，盾鼻集，（中華書局，臺北，民五十年），頁一一五。按「前大總統袁公」一語，係宣布討袁之後之稱謂，有不再承認其爲中華民國總統之意。

⑫ 「進步黨成立記」，時報，二、六、三。

⑬ 劉芬翁，民國政史拾遺，（臺北，民四十三年）頁二四。

一派卽屬如此；第二、政治家與現實實力之接近，爲勢之必然，指導實力人物爲一定的趨向；袁世凱是實權的握有者，是引導和監督的對象。

但是引導與監督的性質是不相同的。欲加引導，必先結合；通常引導者與被引導者是平行的。監督則不然，有威臨之意，不聽則施以壓力而使之就範。梁任公的引導論係指其個人連同少數知已者與袁氏結合之意。他們親身從政，建立大政方針，希望藉袁氏之力而推動，眞正建立民主共和的社會。任公與袁氏結合，委曲求全，始終不願輕易放棄。自民國二年七月入閣任司法總長，擘劃運籌，欲一顯身手。不幸因熊內閣之倒坍而連同去職，未能如願。但旋卽轉任幣制局總裁，再轉任參政院參政，雖每況愈下，却藕斷絲連。任公似不願與袁氏完全斬斷關係⑭，卽使委曲至再，仍希望潛移默化，使之脫出傳統的惟我獨尊觀念。

所謂監督，任公希望能建一大政黨，以袁氏爲魁，用合議制來約束其行動。加上國會的運用——以國會監督政府，可以加速政治之步入軌道。但袁氏何等詭譎之人，其婉拒進步黨之推戴，雖種種自圓其說，而避免自陷束縛，蓋爲主要原因。就整個發展觀之，袁氏旣不受引導，更不受監督。相反地，他要引導別人，强從已意。我們看不出梁任公對袁氏有所影響。自司法總長而幣制局總裁而政治顧問，自以爲是委曲求全，何嘗不是中了袁氏羈縻之計。任公認爲進步黨無力約束袁氏，國會必可發生作用。豈知袁氏之破壞國會，如摧枯拉朽。國會面臨停閉，進步黨人尙以爲可以挽回，奔走呼號，希望維持法定人數，徐徐圖之。豈料袁氏不僅不要國民黨，連進步黨也要一齊掃滅。國會停了，國民黨被解散了，進步黨亦奄奄一息。

總而言之，梁任公旣未能引導袁氏，更不能加以監督，一切想法，只是一相情願。此卽民國初造的梁、袁關係。

(二) 從勸說到反抗

梁任公警覺袁世凱帝制自爲之野心，在三年年底；由於袁氏改國務總理爲國務

⑭ 任公於三、二、二十獲准辭司法總長，二、十九已任爲高等顧問及幣制局總裁。三、五、廿日爲參政院參政。三、十二、二七獲准辭幣制局總裁。四、二、十二任爲政治顧問，四、三、二一派遣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事宜（未就任）。四、七、六任爲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卿，大封諸侯，種種復古做法，「舉動越看越不對了。」⑮ 因此潛意識中已覺其不免。到了四年年初，帝制的陰謀就得到了證實。元月間袁克定邀宴，在席上克定與楊度「歷詆共和之缺點，隱露變更國體之意」，「知禍將作。」⑯ 但是此時任公並無亟起反抗之意，雖然他的大中華發刊詞起首慷慨激昂，全篇却是虎頭蛇尾，無絲毫抗拒之意⑰。

一個從事溫和改革的政治家，對於任何不合理的政象，不至絕望，甚難持激烈的反抗態度。他所遵循的軌道是勸說，或曉以利害，希望在不着痕跡中將之消融。自立憲運動以來，梁任公所採取的便是溫和路線。他指導立憲運動，便以「勸告」與「要求」爲原則⑱。面對袁氏的帝制陰謀，也想因勸說而使其懸崖勒馬。

四年五月初，帝制傳言益甚。是時，任公爲其父祝壽北返，漫遊至杭州，得悉風聲甚緊，即與上將軍馮國璋商議，擬因馮之實力及自已的辯才而加以勸阻，是爲第一次之諍諫。關於此次勸說的經過，任公曾有所敘述，由其弟子吳其昌筆記，茲引錄如下：

「袁項城拒諫飾非，作僞術之巧妙，登峯造極，古今無可倫比。時帝制論已塵囂全國，馮華甫（國璋）自南京來京，邀余〔任公〕同往作最後之諫諍。華甫曰：『我之辯說遠不如子，子之實力亦不如我。必我與子同往。子反覆予以開導，我隱示以力爲子後盾，庶幾千鈞一髮，危機可挽。』余諾之。乃盡一日夜之力，密草諫說綱要至數十條，竭盡腦汁，凡可成爲理由者，無不備舉，欲爲垂絕之國運，億萬之生靈，打最後之一針。及二人聯翩至新華宮，項城聞吾等至，喜動顏色。酒酣，余正欲起立陳述，項城先笑曰：『二公此來，吾知之甚稔，乃欲諫我不做皇帝也。我問二公，袁某欲做皇帝者，究思作一代皇帝而絕種乎？抑思作萬代皇帝而無窮乎？』余與馮愕然未答。袁

⑮ 「護國之役回顧談」，飲冰室文集之三十九，頁八八。

⑯ 「國體戰爭躬歷談」，盾鼻集，頁一四三。

⑰ 「大中華發刊詞」，大中華（中華書局，上海，民四年），第一號，四、一、二〇；又見飲冰室文集之三三，頁七九。

⑱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北，民五九年）第三章。

又笑曰：『余非痴人，自然欲作萬代天子。』乃喟然嘆曰：『我有豚犬二十餘人，我將盡數呼出，立於二公之前。任公，君最善知人，我卽託任公代我選擇一子，可以繼立爲皇帝，可以不敗我帝業，不致連累掘我祖墳者。任公，待君選出之後，我再決定稱帝。如是者可稱帝二代。』余與馮四目相視，嗒然如傷，懷中萬言書，竟一字不出。」⑲

袁氏佯稱不願帝制自爲，振振有詞，甚至於說，如果百姓强其黃袍加身，他在英國倫敦已買好了房子數棟，卽將以倫敦作汶上，非逃不可⑳。

第一次的諍諫如此結束，因爲袁氏「矢誓不肯爲帝，其言甚爲懇切，」㉑任公也就只好存疑。事實上帝制計劃正加緊進行中。八月三日，古德諾（Frank J. Goodnow）的「共和與君主論」發表，楊度的「君憲救國論」旋亦出現。八月十四日，「六君子」的籌安會宣布成立。任公方始明白前此袁氏對他和馮國璋之言，均爲僞飾，決心反抗。惟尙未至採取行動的時刻。此時，他只想針對古德諾、楊度及籌安會的種種說法，用自己的筆去駁斥，並明白指出袁氏不宜稱帝，希望不要逼到非動干戈不可，因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關於駁斥古德諾、楊度及籌安會部份，純爲理論問題，下文另有討論。其謂袁氏之不宜稱帝，直言其爲民國總統，宣誓效忠國家，誓詞「上以告皇天后土，下則中外含生之儔，實共聞之，」不能背誓。稱帝只有兩種可能性：第一、「對外一戰而霸，功德巍巍，億兆敦迫，受玆大寶，傳諸無窮。」第二、「經第二次大亂之後，全國鼎沸，羣雄割據，剪滅之後，乃定於一。」㉒然此兩種可能性，前者無寧諷刺袁氏不要忘了最近日本的二十一條，後者則暗示稱帝將引起羣雄割據，全國鼎沸。任公更明白指出，經過民國三年之約法改定，「新頒之大總統選擧法，事實上已成爲終身總統制。」終身總統與皇帝何異，如何定必逆世界之潮流而變更國體？總統旣已終身，所顧慮者，繼承問題而已。然此有「金匱石室」辦法，「傳賢傳子，純屬前大總統的自由。」卽使代

⑲ 吳其昌，「梁任公先生別錄拾遺」，思想與時代，第十三期，（三一、八、一）。

⑳ 「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盾鼻集，頁九六。

㉑ 「國體戰爭躬歷談」，盾鼻集，頁一四三。

㉒ 「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盾鼻集，頁九四～九六。

代傳子，他人亦不得干預，又何須變更國體？

凡此種種曉以利害的說法，袁氏充耳不聞，帝制的進行更為加緊。到了十二月十二日，袁氏接受了所謂的推戴，承認帝位，就待踐祚而已。任公知道事已無可挽回，即於十二月十六日自天津乘輪南下，從事實地的反抗運動。然當其束裝就道之前，仍希望能有轉機，不致頁動干戈，所以再致袁氏一函，促其回頭是岸。

這封信雖然仍舊旨在曉以利害，實則無異一哀的美敦書。信首說：「國體問題已類騎虎，啓超良不欲更為勸阻，徒蹈愆嫌。」㉓惟吾必須加以最後之警告，爾「明誓數四，口血未乾」，稱孤道寡，個人信用隳落事小，國本動搖事大。今之稱帝，所杖持者，明為擁戴，實則威力。「夫使僅持威力而可以祚國也，則秦始、隋煬之胤，宜與天無極。」然其結果如何？即認擁戴屬實，其能有陳橋之謀，則不難有漁陽之變。奉勸爾「踐高潔之成言，謝非義之勸進」，立即取消帝制。信尾有幾句警語：

> 「啓超誠願……〔爾〕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紀元，不願……〔爾〕以一身作中國過去舊奸雄之結局。願……〔爾〕之榮譽與中國以俱長，不願中國之歷數隨……〔爾〕而斬。是用椎心泣血，進此最後之忠言。」㉔

勸說至此，仁至義盡。袁氏當然不聽，護國之役旋於十二月二十五日爆發。

(三) 反袁的基本理論

反對袁氏帝制自為，梁任公有一套政治學上的理論，其言之成理，由來有自；帝制之迅速被推翻，與這一套說詞不無關係。所以我們在敍述反袁的實際行動之前，不能不將其理論略加討論。

㉓ 此信在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稿（頁四五二～四五四）中，謂為四月下旬所撰，編者誤。按原信又見中華新報十二月二十一日，時報十二月二十三日。此信當成於十二月十六日前後，及任公抵上海，各報始揭載之。

㉔ 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稿，頁四五三～四五四。按虛點原文為「我大總統」四字。自原信氣勢觀之，以爾字代入較為合適。任公此信寄以最後之希望，故仍存與人為善之心，行文不欲惡言相向。

「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是討袁時期傳頌最廣而影響深遠的一篇文字，也就是梁任公反袁理論的代表作。全文之基本精神在「吾儕立憲黨之政論家，只問政體，不問國體」一語㉕。所謂政體國體，以政治學眼光觀之，前者指政治形式（form of politics）而言，後者則指國家之代表象徵（form of state）而言。政治形式又稱政治系統（political system），大分之，有民主（democracy）、獨裁（dictatorship）與集權（totalitarianism）之別，是抽象的㉖，國家之代表象徵，不外君主與非君主（總統或委員長制）之別，是具象的。但梁任公不做類似的繁複解釋。他很乾脆的說：「立憲與非立憲，則政體之名詞也，共和與非共和，則國體之名詞也。」所謂「只問政體而不問國體」，便是只問立不立憲，不問君主或共和。他的條件是：「政體誠能立憲，則無論國體爲君主爲共和，無一不可也；政體而非立憲，則無論爲君主爲共和，無一而可也。」

此一理論，並非創於反袁時期。他在民國元年歸國時，便說過：「對於國體主維持現狀，對於政體，則懸一理想以求必達。」㉗這一句話是有來由的。蓋任公返國之初，革命黨人謂其主張君主立憲，反對民主共和；民國創立，必然遭其繼續反對。任公謂此爲誣衊之詞，絕未了解立憲派人所持的態度。他說：「立憲派人不爭

㉕ 「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盾鼻集，頁八五～九九；又見大中華，第八號（四、八、二〇；衍期，出版日期爲倒塡）。以下引文，如非有特別注釋，均出自本文。按「異」文發表之前，任公曾對報界有所透露。根據申報（四、九、四）及時報（四、八、五）所載，文字完全相同，似爲任公自擬之新聞稿。原文又見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稿，頁四五八～四六〇。據吳貫因說，「異」文的原稿比大中華所載更爲激烈。他親自得見，其中有「就令全國四萬萬人中三萬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贊成，我梁某斷不能贊成也。」後因友人謂袁氏尚未正式承認帝制，初次商量政見，不必如此激烈，乃將此段刪除。任公此文，口誅筆伐，曾謂「我定不坐視此輩鬼蜮出沒，除非天奪我筆，使不復能屬文耳。」（丁編，梁任公先生年譜稿，頁四五七～四五八）文成，袁得聞，曾使人賄二十萬元勿發表，爲任公拒絕。袁因以「危詞脅喝」，謂「君亡命已十餘年，此種況味亦既飽嘗，何必更自苦？」任公對曰：「余誠老於亡命之經驗家也。」（同上，頁四六〇～四六一）時報謂携款赴津購「異」文之底稿者爲夏壽田。（報時，六、一、七）

㉖ Samuel Beer and Adam Ulam, *Patterns of Government*, (N.Y.: Random House.1958) p. 8–11。

㉗ 「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飲冰室文集之二九，頁三；又見庸言，（天津，民元年至三年）第一號（一、十二、一）。

國體而爭政體，其對於國體，主維持現狀，……故於國體，則承認現在之事實；於政體，則求貫徹將來之理想。」㉘ 這一句話主要在說明他雖然主張立憲于清末，到了民國則擁護共和。在清末主張君主立憲是「維持現狀」，在民國擁護共和是「承認現在之事實」，求立憲政治之實現，則爲「貫徹將來之理想。」

此種有類堅白之說，蓋因立憲派與革命黨手段不同之故。立憲派溫和，主張在現狀下改進。革命黨激烈，主張徹底改造。革命黨是革命的，立憲派是反革命的。然反對自反對，革命終於爆發，而且非立憲派人所能阻止。所以到了共和建立，立憲派就不得不「承認現在之事實」，擁護共和。梁任公的說詞，當然是爲立憲派辯護，給立憲派建立生存於民國的理論。不過，立憲派求理想之貫徹也是事實。任公在「憲法之三大精神」一文中，再度強調此一理論，不妨節錄數語如下：

> 「以吾平昔之所信，總以爲國體與政體絕不相蒙。而政象之能否止於至善，其樞機則恒在政體而不在國體。無論在何種國體之下，皆可以從事於政體之選擇。國體爲簡單之具象，政體則爲複雜的抽象。故國體只有兩極端，凡國必麗於其一，〔指共和或君主〕政體則參伍錯綜，千差萬別；各國雖相倣，而終不能相從同也；而形式標毫釐之異，卽精神生千里之殊。善謀國者，外揆時勢，內審國情，而求建設一與己國現時最適之政體，所謂不朽之盛業於是乎在矣。若此者，筦其樞，植其基，其惟憲法乎！」㉙

一部完善的憲法實爲任公一派之最高理想。

面對袁世凱的帝制自爲，任公正好把他的理論搬了出來打擊此一陰謀。他再度强調「只問政體，不問國體」一語。政體盡可求其改進，國體絕不能加以變更。這時，他對於政體與國體之變更有進一步的解釋。他說求政體變更是進化的現象，而求國體之變更則爲革命的現象。在進化軌道上求變更者，恆繼之以進化；在革命軌道上求變更者，則恆繼之以革命。任公一向服膺進化論而反對革命。他解釋變更共

㉘ 同上，頁五。

㉙ 「憲法之三大精神」，飲冰室文集之二九，頁九四；又見庸言，第四期（二、一、六）。

和而力謀帝制者，是爲革命，必須加以反對㉚。

按諸實際，護國軍起義討袁，才是眞正富於革命精神的。但任公不如是解釋。他認爲袁世凱的竊國行爲始可稱之爲革命。他爲革命二字所下的定義是：

「夫革命之意義至簡單而至易了解也，曰：謀顚覆現在國體而別建新國體者，斯謂之革命而已矣。」㉛

這一個定義當然是有疑問的。但他的目的主要在確定袁氏的叛國罪名，所以謂袁氏與楊度等之狼狽爲奸爲革命：

「今之謀顚覆現在國體而別建新國體者，爲北京政府人耶？爲西南政府人耶？……蓋革命者，非他，卽袁世凱其人也。與袁世凱相狼狽者，皆革命黨也。數月來北京政府蠅營狗苟之擧動，皆革命運動也。」㉜

而富有革命精神的護國軍反而變成了正統主義者：

「西南軍政府者，以民國守土之官，爲民國嬰域以守。彼背叛民國公然革命之逆賊，雖據有首都，布僞命於四方，而尙有此一隅之地，未爲叛軍所陷，於以保衞民國正朔與友邦繼續敦睦，而徐圖肅淸逆氛，恢復舊物。由此言之，西南軍政府當然爲民國固有之正統政府明甚。」㉝

這當然是一個溫和型知識分子的說詞。尤其在辛亥革命之後，人心厭亂，聞革命而色變，如不以革命之罪名加諸袁氏，護國軍豈不反而蒙上了造反之名；造反就是革

㉚ 籌安會楊度所發表的「君憲救國論」（見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文星，臺北，民五一年〕頁一七七～二〇七），强詞奪理，謂共和不能立憲，惟君主始能立憲。任公不得不伸引其理論來加以駁斥，反問楊度何以前淸之君主時代不能立憲，而要革命？倘若回復帝制之後又謂不能立憲，而再度要求共和，豈不革命相循，國將不國。因謂「國體與政體絕不相蒙」，無論何種國體均能立憲，亦均不能立憲；在現狀下求改進則可，謀變更國體而求託於政體之改進則不可。

㉛ 「西南軍事與國際公法」，盾鼻集，頁一一四。

㉜ 同上。

㉝ 同上。

命，這是任公所不願的。再者，此時不僅袁氏稱西南軍事爲革命，任公亦有畏懼每革命一次，則國家元氣大傷一次的說法。嘗云「鬩牆之禍，在家庭爲大變，革命之舉，在國家爲不祥。」㉞如何而可以爭取到國人的同情，進而掀起全面的反袁狂潮，正與此一理論有關。護國軍的對外文書大多出於任公之手，而未嘗脫於此一理論。雲南討袁檄文誓以四事，其中一、三兩條云：

> 「與全國民戮力擁護共和政體，使帝制永不發生；建設名實相副之立憲政治，以適應世界大勢。」㉟

仍本着「只問政體，不問國體」的原則。任公的理論架構是討袁獲致勝利的原因之一，民國之終於確保，也與此一理論有相當關係。

㈣ 軍務院的構想及善後辦法

梁任公決計反袁，預料這次的舉動將是漫長而艱苦的。諸事必須妥爲籌劃，穩紮穩打，期能致勝。他想盡力的方面很多，最先刻意於外交及籌款，似均無所獲㊱。最後前往西南籌組護國軍政府——軍務院，才發揮了他的政治家的潛能。

軍務院是護國軍的最高機關，其構想幾完全出自任公一人。該一構想發軔於滯留上海期間。自上海南下途中，與左右談論，（同行者有湯叡、黃羣、蔣方震、吳

㉞ 「雲南致各省通電」，盾鼻集，頁三。

㉟ 「雲貴檄告全國文」，盾鼻集，頁五。

㊱ 任公採聯日制袁政策，在上海晤日本駐滬武官青木宣純（日本派赴中國中南部與國民黨、進步黨及反袁人士聯絡之負責人），得其協助，始順利自上海南下香港。由香港赴安南，偸渡海防，潛赴廣西。（「從軍日記」，盾鼻集，頁一二一～一二七；「致蔡松坡第五書」，同上，頁二五～二六；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稿，頁四六七～四九二；吳其昌，「梁任公先生別錄拾遺」，思想與時代，第十三期）曾與犬養毅等有信函往還，並遣周善培往謁，冀得財力槍械之助，惟似無何結果。（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稿，頁四六八～四六九）任公本擬赴日本一行，以蹇念益等報告北京將有大變，遂放棄東渡之計劃。

籌款方面，任公滯留上海七十餘日，目的之一，在籌得鉅款支持護國軍。因無所得，擬遣其婿周希哲赴南洋募捐，亦未果行。再又爲雲南方面規劃擴大富滇銀行之招股，勁用關餘，似亦緩不濟急或交涉不果，故籌款方面可謂完全失敗（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稿，頁四六七～四七〇）。

貫因、藍公武、黃孟曦、唐伯珊等人）構想成熟。五年三月中旬到達廣西，即與陸榮廷及雲貴方面接洽，希望早日建立統一組織，惟因廣東龍濟光之首鼠兩端，一時無法協調，構想不得不暫爲擱置。到了五月一日兩廣都司令成立，任公再提初議，往復磋商，決定由雲貴兩廣四省都督合組軍政府，即定名爲軍務院。這就是護國軍與袁氏對峙的機關。

軍務院的構想，表現在五號連續發布的公報中。這五號宣言，完全出於任公之手，第一宣布袁世凱的叛國罪行，並討伐之；第二以黎元洪爲合法的繼任者；第三以軍務院代國務院；第四宣布軍務院之組織條例；第五公布軍務院人事。這五號宣言向全國人報告了一個新政府的誕生，並强調其合法性及崇高的理想。

顯然的，要成立一個新的政府，自必宣布袁世凱的叛國罪名，這是一定的步驟，所以以此爲第一號宣言。至於以黎元洪爲合法的總統繼承人，則屬非常的遠見。所謂護國，必須在法律範圍內行之。當時國家的最高法律爲約法，護國人士指責袁氏破壞約法，自身當然必須遵守約法。約法中規定大總統因故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若果違反此一原則，必然受到責難，指爲爭權奪利。按未有此項決定之前，軍務院擁戴何人爲領袖，議論紛紛；有主張岑春煊者，有主張蔡鍔者，有主張唐繼堯者，甚至有主張馮國璋者㊲。惟任公以黎元洪爲合法之繼承人，可謂獨具慧眼，其嚴守法律，强調了護國人士有高尚的理想，非爲爭權奪利而來。

以軍務院代國務院，「國」字換成了「軍」字，一字之易，也可以說有獨到之處。根據大總統選擧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以副總統代理之；副總統同時缺位時，由國務院攝行其職。」袁世凱叛國，黎元洪繼任，但黎氏在北京，「身猶蒙難」，「國務院又非俟大總統任命，國會同意後不能組織」，在這種情形下，只有藉「軍事正亟」與「求統一之方」之名，「特暫設一軍務院直隸大總統，指揮全國軍事，籌辦善後庶政。」㊳此一說法，從法律的觀點言

㊲ 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謂：「雲貴起義而後，所極費討論者，則爲總統問題。當籌安會發生後，馮華甫〔國璋〕有反對帝制消息，上海民黨多謂馮如能首義，即擧馮爲總統。繼而馮默無所擧動，南方民黨又有謂岑西林〔春煊〕於新舊人物皆能融洽，有擬擧岑西林爲總統者。滇黔師興，又有謂宜擧唐蓂賡〔繼堯〕或蔡松坡〔鍔〕爲總統者。」（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稿，頁四七七。）

㊳ 盾鼻集，頁八～九。

，無絲毫破綻。若建一「指鹿爲馬之責任內閣」，其所以異於袁者幾希！

軍務院設撫軍，獨立各省之都督及統有二師兵力以上之總司令爲當然撫軍。用合議制，「厲行開明專制，磊磊落落，名實相符，」任公認爲是「臨時政府最善之制。」㊴從爭取各省都督響應的觀點言之，此似爲必然的手段。

撫軍互選一人爲撫軍長，因爲唐繼堯在名義上是首義的領袖，不能不推其爲撫軍長。但是護國軍應該有一位資望堪與袁世凱相抗衡的人來主其事，此人非岑春煊莫屬。岑氏不僅可以與袁匹敵，而且是國民黨人，爲了表示與國民黨合作的誠意㊵，亦以推岑爲上。任公幾經苦思，得了一套說詞，他在一個電文中說：

> 「軍務院組織……惟人地兩問題待商。竊意撫軍長一職，以滇省首義之勳勞，自非蓂公莫屬，黔、桂、粵當無異辭。惟以交通計，其地點似不能不在粵。蓂公既不能來粵，擬增設副長攝職，推西林任之。」㊶

軍務院設於廣東，固有交通方便之關係，但決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任公擁岑爲號召的由來已久，如此到能自圓其說，其考慮也有獨到之處。

軍務院宣言書中說：「俟國務院成立時，……〔軍務院〕即可裁撤。」此一規定，使討平帝制之後該一組織不爲他人利用，其避免國家分裂的眼光又是勝人一籌的。按軍務院於五月六日成立，至七月十五日宣布取消，爲時不過二月餘，時人有批評此舉爲任公亟謀與段祺瑞接近之手段，因此奉以「陰謀家」的綽號㊷。然任公於討袁之後，並未入仕，其與段祺瑞之合作，在六年討平復辟以後，此說似難成立。軍務院撤消之條件爲恢復約法，召集國會。及兩者均已宣布依法恢復，護國軍之目的已達，自無繼續維持軍務院之理。任公之力促唐繼堯取消，與袁氏死後的復辟暗潮頗有關係。任公云：「恐有人假借名號，生事佔亂，將來反動之結果，轉助復辟派張目，此最可憂，」㊸已明白說出其要求早撤的原因。所以自七月一日起即與

㊴ 「從軍日記」，盾鼻集，頁一二三。

㊵ 梁任公與國民黨的合作關係，詳即將出版之「梁啓超與民國政治」一書。

㊶ 「致各都督各總司令電」（五、四、二八），盾鼻集，頁四三。

㊷ 「軍務院成立始末記」，革命文獻（四七）（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臺北，民五九年），頁五三三。

㊸ 「致各都督各總司令電」（五、六、二八），盾鼻集，頁六九。

西南各都督通電，主張及時撤消。及浙江都督呂公望公開主張撤消，任公卽公開和之，唐繼堯旋亦接受任公的建議，於七月十五日發布撤消令。吳貫因說：「軍務院終當撤消，則提前撤消，以示交相讓步，顧全大局，此正公忠體國之所爲。」㊹所說固有頌揚之意，然亦非無所見。

護國軍起義，以倒袁爲目的。及至袁氏突然死去，局勢爲之一變。當此羣龍無首之際，凡是有野心的人都可乘時而起，角逐權力。如果此時沒有一個原則來指導時局的解決方向，民國之失去秩序，已不待軍閥之羣起。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梁任公立卽致電北京，要求段祺瑞「速奉黎大總統卽日依法就職。」同時警告段氏，若別生枝節，卽將爲萬矢之的。另外又致馮國璋一電，作同樣的表示。相對地，任公另致護國軍各撫軍一電，要求他們分電段祺瑞速奉黎元洪就職，同時籲請他們支持段祺瑞來「收拾北方」。再有一電致黎元洪，促其委任段祺瑞依法組織內閣㊺。這四電的重要性是非常明顯的。以當時情勢而言，段、馮和南方起義諸將領均可左右政局。首先將他們導入正軌，實屬必要。

梁任公的種種措施，可以說是根據軍務院擁戴黎元洪的原則推演出來的，也可以說是一個有機智的政治家之直覺反應。四電分別在五年六月七、八兩日發出，正是袁氏死後的第二日和第三日。一週之後，任公擬定了全盤的善後計劃。他提出：㈠恢復舊約法；㈡召集民二國會；㈢懲處贊助帝制之禍首；㈣南北兩軍自前線撤退，解除敵對狀態；㈤廢除將軍與巡按兩官制，一律改稱都督；㈥南北各推代表在南京或武昌開善後會議。這六大原則最重要的是前三條。恢復舊約法及民二國會是息息相關的，其要義也在維護共和。要求懲處帝制禍首有其重大的意義，蓋袁氏之稱帝與楊度等「十三太保」之贊助大有關係，若不予以懲處，人心何能得平？何況袁氏一死，復辟派卽大肆活動，懲處禍首有殺鷄儆猴的作用，或者可以消滅帝制思想。

任公的通電及善後六原則的宣布，可以說是針對段祺瑞、馮國璋等實力人物而發。如果他們不以擁戴黎元洪繼任爲然，則盡可藉口不恢復約法。段祺瑞確有惟我

㊹ 「丙辰從軍日記」，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稿，頁四九七。

㊺ 以上各電均見盾鼻集，頁五二～五四。

獨尊的想法。他雖然在輿論的壓力下讓黎元洪坐上了總統的位置，轉瞬間又改變了主意，不願恢復舊約法。他的藉口是「不能以命令變更法律」，也就是不能廢止民三的新約法。如此一來，任公的六原則的第一條眼看就不能實現。因此，不得不正告段氏，「三年約法，絕對不能認為法律。」如果依照段氏的三年約法為法律的說法，則總統當從「金匱石室」中求之，其奉黎元洪為總統便錯了。不僅如此，其本身的國務院也沒有來歷，因為新約法中根本沒有這兩項辦法。「今國人誓死爭者在根本法」，也就是民元約法。段氏所堅持的三年約法為非法，鐵案如山，如何能曲意解釋㊻？段祺瑞知道拗辯不過，只好放棄了自己的主張㊼，黎元洪因此才算坐穩了總統的大位，國會才得在八月一日恢復重開。如果說梁任公對再造共和有所貢獻，他所提供的政治見解是關鍵所在。固然時人也有不少持有相同的意見，但任公奔走呼籲所發生的影響是一般人所不及的。

㈤ 梁蔡反袁的志氣

戊戌變法時期，梁任公與康有為並列，到了護國之役，則與蔡鍔相提並論。顯然的，任公在護國之役中的重要性遠過於戊戌變法，其與蔡鍔的密切關係，又遠過於康有為。同是師弟關係，對康為弟，對蔡為師，此千古之美談，後先輝映。這裏略語梁、蔡如何反袁，並論師弟間彼此所發生的影響。

梁、蔡從事倒袁，論憑藉，除了任公的一枝「富有魔力的筆」及蔡在雲南的一些部舊關係之外，可說一無所有。但是他們之所以敢於起而與袁氏相抗，全靠他們的「亡秦必楚」的決心。有此堅毅不拔的決心，才發生了宏偉鉅大的力量。蔡相信其師的文字宣傳定可掀起全國反抗的狂瀾；任公則相信其弟在西南必能建立一個堅強的基地。他們認為這次的行動是「為四萬萬人爭人格。」㊽其結果可能是成功，也可能是失敗，但得失皆所不計。如果成功，他們將功成身退，轉入學術界，一心做學問。如果失敗，則準備以身許國，一不逃租界，二不逃外國㊾。

㊻ 「復段總理電」，盾鼻集，頁六四～六六。

㊼ 為說服段、馮，任公曾遣黃羣入京，周善培赴江寧，進行勸說。（「復陳護督陸都督電」，五、六、十四），盾鼻集，頁五九。

㊽ 「護國之役回顧談」，飲冰室文集之三十九，頁八九。

㊾ 同上，頁六四；劉達武編，蔡松坡先生遺集，年譜，（文星，臺北，民五一年）頁二一。

籌安會宣布成立的次日，也就是四年八月十五日，他們就下定了此一決心。有志一同者，加上了任公的知友湯叡和蹇念益二人[50]。經過多次的討論，反袁的計劃大致確定：由蔡鍔入雲南領導起義，任公與湯叡至上海遊說活動，蹇念益等則留在北京偵察袁氏的行動[51]。

任公與蔡鍔能有一致的看法，這與他們深厚師生之誼大有關係。蔡於十六歲入時務學堂拜及任公門下，受民族主義的啓廸，是師生情誼之始。戊戌政變，任公遠走日本。時務學堂解散，蔡鍔亦於次年輾轉東渡，入高等大同學校，再度追隨。任公爲了培植蔡氏，曾託請大隈重信擔保，使入士官學校[52]，奠定其未來的事業基礎。蔡氏在日本六年，一度襄贊新民叢報編務，任公的「東京久堅町援席之笑語」蓋指此而言，他們的過從，使師生之誼益爲篤實。

辛亥革命，蔡鍔響應獨立，成爲雲南都督，聲譽鵲起，任公倚重之念自此而始——由師生之誼而引爲政友。所以他們民國三年在北京的聚首，約同湯叡在一起讀書，研究政治經濟軍事，發了痴想，想帶着袁世凱走上現代化的政治軌道。他們有意爲民國盡力， 建設一個富强康樂的社會。 不幸袁世凱的稱帝， 打破了他們的美夢。

反抗袁氏，一個靠的是槍，一個靠的是筆[53]。持槍的在西南發動了，持筆的在上海遊說響應。蔡鍔想迅速打下四川與袁氏持久周旋，任公則想得到馮國璋的響應

---

[50] 任公云：「籌安會發表宣言的第二日，蔡公〔鍔〕從北京搭晚車來天津，拉着我和我們另外一位親愛的朋友——這個人現在還在着，因他不願意人家知道他，故不說他的姓名——同到湯公覺頓〔叡〕寓處，我們四個人商量了一夜。」（「護國之役回顧談」，飲冰室文集之三十九，頁八八）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據云爲蹇念益（見周素園，「梁啓超護國之役回顧談正謬」，命命文獻〔四七〕頁八九～九○）；蔣復璁謂蹇念益曾親自告訴他這次反袁會議的經過：「〔蔡鍔〕到天津下車，卽至意租界梁宅，其時新會〔梁任公〕及季常〔蹇念益〕先生、黃遠庸、湯覺頓正在打牌。蔡公神態閑雅，若無其事。於是卽共起集談，決定了梁蔡的行動。」（蔣復璁，「石虎舊夢記」，自由談，十五卷，五期〔五五年五月〕）兩說之出入處是多了一個黃遠庸。任公所記無黃氏，似是換了地方談話，而黃氏未參加。亦可能兩說並非同時，蓋任公等之計劃反袁，曾經多次聚談，參與者又加入了陳國祥、徐佛蘇、戴戡、王伯羣等。（「通電」，盾鼻集，頁八二；又見時報，五、七、十六、）

[51] 同上。

[52] 毛以亨，梁啓超，（亞洲出版社，香港，民四六年）頁一一四～一一五。

[53] 「護國之役回顧談」，飲冰室文集之三十九，頁八九。

以壯聲勢。然而蔡在四川以「五千人的餓疲之衆」對抗曹錕的「十幾萬器械精良糧食充足的軍隊，」幾於不支㊹。馮國璋亦觀變而無所行動。任公力謀與蔡氏呼應，不得不潛赴廣西另求發展。由於他們的艱苦奮鬪，蔡在川南終於立定了脚跟，任公在兩廣亦打開了局面。護國軍的形勢穩定了，各方面的同情也多了，局勢方始轉而有利，也才看到了勝利的曙光。

梁蔡在艱苦不拔中戰勝了袁氏。當然，勝利之到來並非因爲他們有過於袁氏的實力，而是他們恃着維護共和的正義大旗，得到全國人精神上的支持，使袁氏在心理上不能競爭㊺。梁、蔡在是役中爲他們自己帶來了無上的榮譽，也爲進步黨帶來了聲光。五年六月六日，袁氏死去，梁、蔡的目的達到了。

這時候，他們的進退如何呢？依照最初的決定，他們要功成身退，再又預見將來「雜於虎豹蛇蠍鬼蜮中」的混亂局面，必定一無可爲，梁任公的「還我書獃子生涯」的念頭十分强烈。但五年年初，此一退隱之念似已不如起事時堅定。任公謂每念及曾文正以忠義勸人，「苟且自全，則魂魄猶有餘羞」之言，似不再堅持退隱的想法。又說：「當冰山驟傾，鼎沸方始之際，終不可無人周旋其間。」他認爲如果發生亂事，決不能袖手旁觀。且「環視全國，其能與各方面接洽而作緩衝者，舍區區外，似尙無其人。」「在風雨飄搖之境，仍不得不獻身此大局裝點門面。」㊻

同樣的，蔡鍔雖然時時也念着退隱之事㊼，但並沒有自此飄然遠翥的意思。他希望將來有機會爲國家做一番有意義的事業。如有可能，願意整頓「樸勇耐勞」的北方軍隊，使其成爲現代化國軍的基礎㊽。

㊹ 同上，頁九二。

㊺ 任公云：「護國成功，原來是全國民心理所造成，並不是靠一部分幾個人之力。」同上，頁八七。

㊻ 「致蔡松坡第五書」，盾鼻集，頁二六。

㊼ 蔡於五年七月間致唐繼堯等電云：「儕輩中果有三數人身先引退，飄然遠翥，實足對於今日號稱偉人志士英雄豪傑一流，直接下一針砭，爲後來留一榜樣，未始非善。而鍔處地位，純係帶兵官，戰事既了，即可捧身而退，斯亦各國所同然。」（劉達武編，蔡松坡先生遺集，〔文星，臺北，民五三年〕軍政電文下，頁二四）

㊽ 蔡鍔致唐繼堯電後不久，曾對劉顯世說：「北軍樸勇耐勞，爲全國冠，惜少國家思想與軍人智能，得賢將領以董率改造之，確可植國軍之基礎。弟甚欲置身彼中爲此後改良之導線。」（同上，頁二五）

梁、蔡改變他們的意志是必然的，蓋原則因性格而定，性格又因時勢的發展及個人事業的展望而定[59]。他們是討袁的功臣，袁氏已死，民國的障碍已除，正可大顯身手，一展抱負。

但不幸的是，他們都不得不退，一迫於禮教，一迫於疾病。任公因爲父親之去世[60]，不得不遵守傳統習俗，辭去本兼各職，居喪讀禮[61]，蔡鍔則因喉疾惡化而不能不赴日本就醫。

梁、蔡雙雙退出政壇都是不得已的。當任公宣布退隱時，尙不知蔡氏已罹不可挽回的絕症。他希望蔡氏繼續留川，控制川省作爲進步黨的根據地。他一面以「冀莊嚴此土爲國人覓一遺種」鼓勵蔡氏，一面遣黃羣入京活動以蔡主川。然及至活動成熟，北京發表蔡氏主持川省軍民兩政，蔡氏却急待脫卸赴日就醫。更不幸的是蔡在日竟一病不起。

兩氏的退隱使再度重振的進步黨黨勢又頓然衰落下來。任公之不出，使進步黨失去了領導的重心。蔡鍔之死使進步黨以四川爲憑藉的希望爲之幻滅。任公之碍於禮制是暫時的，蔡之病逝則爲不可彌補的損失。任公嘗感進步黨過去「無尺寸之根據地，惟張空拳以代人吶喊。……無往而不爲人刼持，無時而不爲人所利用。」[62]如能控有四川，有了後盾，個人及黨勢均可有所支持，有所發展。蔡氏中道而殂，實力主義不克實現[63]。任公在「祭蔡松坡文」中很悲痛的說：

---

[59] Wright Mill, *The Power Elite* (N.Y. : Oxford Press, 1959) p. 257。

[60] 自袁氏宣布停止帝制，各方對其是否退位看法不一。任公爲促成袁氏之早日退位，於五年五月十八日出香港轉赴上海，二十日到達，三十日始聞其父蓮澗先生三月十四日逝世的消息。（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稿，頁四九三～四九四。）

[61] 守制期間，黎元洪曾請其出任總統府秘書長，爲任公所拒。

[62] 「致籍亮儕等書」，盾鼻集，頁二八。

[63] 最初的計劃，如果蔡氏必須入北京活動，則由蔣方震繼起川局。蔡以喉疾去日本就醫，以戴戡入替，爲暫時的措施。蔣方震於料理蔡氏之喪事後，延至次年七月入川，行至重慶，得悉戴戡爲四川軍人劉存厚敗死之消息，局勢大變，蔣知已無可爲，未再繼續前進。（蔣復璁，「先叔百里公年表」，蔣百里全集〔傳記文學社，臺北，民六十年〕，(六)，頁三三）

「嗟乎！嗟乎！天不欲使余復有所建樹，曷爲降罰不於吾身而於吾徒！況乃蓼莪罔極，脊令畢逋，血隨涙盡，魂共歲殂！」[64]

任公已看清了自己未來的前途，其日後之不能有所作爲，正如民國早期之孫中山一樣，都是因爲沒有實力憑藉的關係。蔡氏之死，於梁爲不堪的打擊。

---

[64] 飲冰室文集之四四上，頁十。